

# 让哲学回到“地上”，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追忆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



▲陶德麟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图片由武汉大学提供）

本报记者李伟

刚过小满几日，陶德麟先生去世的消息如同武汉闷热天气一般让人感到窒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师生们无不悲痛。

是夜，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倾泻在珞珈山郁郁葱葱的树木丛中，仿佛苍天挥泪，送别这位学问大家。

他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是他一生的追求。

1978年，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克服重重阻挠后应邀参加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

他发表系列论文，系统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在学界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为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他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培养学生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凡和他交往的人，无不称赞其大师风范、宽仁大度、高风亮节、平易近人。在他的身上，展现着一位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他是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他是航行于浩瀚无际的真理海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舵手。

5月24日，陶德麟先生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9岁，珞珈山上痛失一位智慧长者。

##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名学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不觉得有重任在肩。直到陶老师病重，才感到自己还有一份责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和学习，已有30多年。

何萍告诉记者，陶老师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经常通宵达旦写作，直到近五年患上慢阻肺后，才有了住院治疗的历史。何萍原准备元旦后去医院探望陶老师，可是，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她无法成行，只与老师微信视频过几次。

何萍说，陶老师乐观积极，这次新冠疫情来袭，老师在医院里也很关心战“疫”进展。当他得知全国的疫情特别是武汉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时，非常高兴。3月18日，陶老师在学院群里发了一段自拍视频。

“亲人们，在这次抗击凶恶的新病毒的时候，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大获全胜啊，人人都是胜利者。”在视频里，这位89岁的老人像一名不屈的战士，满面笑容、一脸坚定。

陶老师去世的噩耗传来，在悲痛之余，何萍向记者回忆起去年8月2日、3日的两次面谈经历，“没想到这竟成了陶老师留给我的一份珍贵的学术遗嘱。”何萍说。

去年8月2日上午，何萍到陶老师家中汇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丛书》出版的事宜，当时陶老师尽管在吸氧，但是头脑清晰，交谈之中，两人谈到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关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这一段历史，如果再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还原它的真相。

两人都认为现在的青年学者接受的都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简单地等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这种观念阻碍了青年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第二天，陶德麟再次叫何萍来到家中，明确提出希望何萍能够将这段历史清理出来，给日后人们科学合理地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事实依据。

“就在那一瞬间，我有了一种使命感。”何萍说，当时自己赶快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同时拿出手机进行录音。陶老师一边吸氧，一边讲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写过程，讲述当时的各种思想争论，以及成书的情况，并提供了搜集资料的线索。

何萍回忆，当时，陶老师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老先生头脑冷静清晰，对文本熟稔于心，对历史信手拈来，令人敬佩。

何萍与同事李维武两人一起为陶德麟先生写了一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也是对先生一生工作的写照：“读实践论释实践论在实践论中发现哲学真理，讲中国化写中国化在中国化中阐明马列主义。”在中国化写中国化在中国化中阐明马列主义。陶德麟先生一生的追求，他始终致力于以清楚明晰的语言表述复杂的哲学问题，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

## 思深行范、追寻真理

一生追寻真理，矢志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46岁的叶中央此时早已习惯了大风大浪。窗外的电闪雷鸣他浑然不惧，唯一担心的，还是灯塔。

在20世纪80年代，白节岛灯塔尚未应用电子旋转设备，灯器正常运转需要依靠人工每隔一小时操作手摇装置提供机械动力，业内称之为“上弦”。然而，风力太大，一般人几乎无法步行靠近灯塔。怎么办？叶中央踌躇之间，同事来提醒，“上弦”的时间到了。

“我去！”叶中央说。凭借丰富的岛上生活经验，叶中央一眼就挑出了前往灯塔最背风的那条路径。然而，刚挪动两步就被台风吹得直打趔趄。叶中央马上蹲下身子，用最减少受风面积的匍匐姿态爬行前往灯塔。短短20米的路，叶中央爬了十多分钟。

事后，叶中央说，那次“还不错”，没有被台风“老爷”请进大海里去。对于叶静虎和叶超群而言，他们在成为灯塔工之前，本可以有其他的人生道路可选择。1984年，叶静虎在建筑公司开拖拉机，收入是父亲的两倍有余。而叶超群上学时的专业是人力资源，原本想跳出家里“守塔人”的职业圈。

然而，兜兜转转，二人都还是最终接过了五代相传的职业接力棒。没办法，总觉得还是“放不下”。叶静虎说，他放不下父亲，放不下从小心心念念的大海。“就像我父亲当时说的，‘灯塔充满了召唤的力量，那

话，著作等身，影响深远。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陶德麟先生的一致评价。

武汉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年过九旬的朱传荣，用手机微信发给记者一篇文章，悼念“共历风霜，情同手足”的老友陶德麟。老先生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全文，饱含深情地回忆自己与陶德麟的一生交集。

朱传荣写道，陶德麟在年轻时就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勇于批评权威的片面性。记得1956年初，在《哲学研究》上看到陶德麟批评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文章，让朱传荣感触很大，并深深记住了陶德麟这个大名。

朱传荣回忆说，当时我国在各行各业请苏联专家做指导的形势下，25岁的陶德麟敢于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少年意气风发，一时引人注目。

在朱传荣看来，陶德麟毕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作为人类谋幸福的科学真理去追求，又作为党的重大事业去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做到了真信、真学和真用的要求。

陶德麟作为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不仅执笔完成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写作和出版，也协助李达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重的学术研究传统和踏实的优良学风。

风云激荡，历史转折的关头，总不乏勇敢站出来的人物。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陶德麟出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研讨会。陶德麟与朱传荣一同赴北京参加研讨会。

朱传荣告诉记者，在小组讨论中，两人还向新华社记者谈了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的内容。为保证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三封信在《哲学研究》上刊出，两人还做了一些排除干扰的工作，可以说，在这场彻底批判两个“凡是”、实现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陶德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到武汉后，陶德麟受邀参与全省关于真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还撰文解答“唯一”的疑难。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疑问。《哲学研究》主编胡传荣倡议，请陶德麟撰文解答。这样，陶德麟下了很大功夫写出《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发表后，学界一致认为，陶德麟的文章从理论上彻底解答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的疑难。

种力量让人对它产生入骨入髓的爱。你没办法，你只有奔向它。”

1987年，原交通部副部长钱永昌在给白节岛灯塔职工的慰问信中写道：“特别是灯塔主任叶中央同志……祖父、父亲、自己和儿子都热爱航标工作，坚守灯塔岗位。他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又为新一代做出了好样子……这种献身精神实在值得敬佩。”

如今，80岁的叶中央早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叶静虎也转到了宁波航标处后勤岗位上工作。叶超群的工作地点，转到了离甬江入海口不远的七里屿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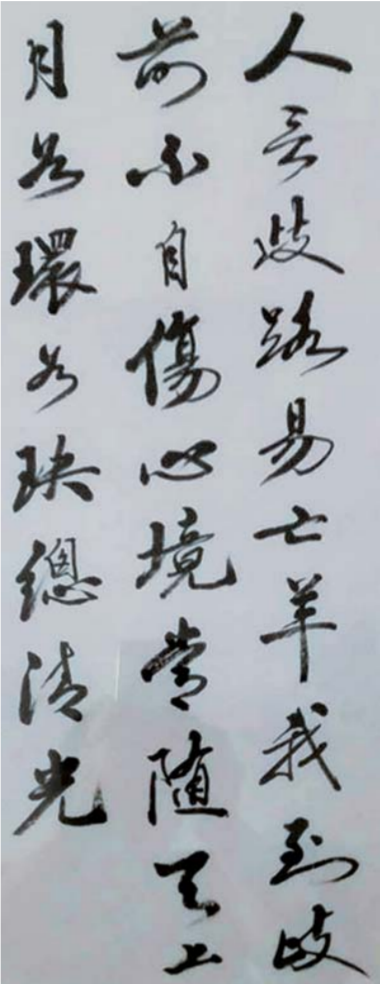
登上七里屿岛山顶，一根十余米高的国旗杆遥遥在外，一抹鲜艳的红色在海天交接的碧蓝晴空下分外耀眼。而在不远处，传来了叶超群手机里播放的小提琴曲——《我爱你，中国》。

## 永远有一束光，为渔民照亮归途

生在那个岛上，是你一辈子的荣耀。

——电影《灯塔世家》台词

1997年，宋江波导演的电影《灯塔世家》在



▲陶先生诗作手迹。

自此，47岁的陶德麟，从学理上有力批驳了“两个凡是”，为破除思想迷信、澄清理论是非做出了突出贡献，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实践派”，蜚声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

陶德麟敢于追求真理、勇于发声，也与他青年时代曾长期担任李达的学术助手有关。他对李达的有关著述和思想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和理解，而李达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做出重大贡献，曾写下代表作《〈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极好”，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

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李维武认为，陶德麟在李达思想影响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开始向干部群众作包括讲解《实践论》在内的哲学辅导报告，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阐释方式。陶德麟的《〈实践论〉浅释》，就是他在半个多世纪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结晶。

“解释性的通俗读物，既要注意学理阐述的精确性，不能违背原文的本意，有损原文的理论深度，尤其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通俗而陷于庸俗；又要注意行文的晓畅生动，力戒艰深晦涩，使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易于看懂，乐于接受。”这是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通俗化阐释的基本原则。

朱传荣说，综观陶德麟在不同时期研究的课题和学术成果，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都是回答当时理论研讨中的诘难问题和理论原则是非不清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而且直接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进展，巩固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使之成为现实实践和人们行动的向导。

作为何萍的学生，李佃来告诉记者，回忆起“师爷”陶先生，老先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熟稔在心，对问题的把握更是深刻，还特别注重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来把握问题。陶先生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强调讲马克思主义语言不应晦涩，要多用自己的语言，他特别反对教条晦涩。

陶德麟先生的学生们都受到他的影响，因为陶德麟反复强调良好学风和文风的重要性。

哲学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我们应当让她从“天上”回到“地上”来。这是陶德麟给学生——汉江师范学院院长杨鲜兰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

加上政府的防控快速有力，我们倒不太担心自身的安全，只盼着“非常时期”赶快过去。”叶超群说。

在电影《灯塔世家》中，齐家第四代守塔人灯笼在中秋之夜向父亲的同事情愫着灯塔工作的未来图景：“叔叔们，你们就等着吧。电脑有了，卫星有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回到岸上去，坐在电控室里用电脑导航，而海岛将成为人们参观旅游的景点。”

灯塔的未来，向何处去？灯塔工的未来，向何处去？叶超群觉得，技术与时代进步既会让灯塔工“改变”，也会让灯塔工“不变”。“先前有人说过，‘轻量化’是灯塔工作的一个趋势。”叶超群说，科技可能会改变守塔的日常状态，“维护”将比“守护”占有更重的分量。这一代守塔人和上一代相比，连续上岛的时间已经少了很多，以后可能会更少，这对于灯塔工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是种“解放”。

宁波航标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的守塔人，守护的不仅是“塔”，更是与塔相伴的机器。传统意义上“守塔人”的概念或许会发生变化，这实际上也是对这个群体提出的更高要求。

“但是，在无光的洋面上，永远要有一束光为渔民照亮‘归来’的路。”叶超群说。“而我们，就是那群为海上漂客归来引路的人。”

陶德麟告诉杨鲜兰，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哲学味”，而把哲学论文写得艰深晦涩，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一篇文章有没有“哲学味”，在于文章论述的是不是哲学问题，有没有哲学思想，而不在于文字上是否艰深难解。

## 宗师典范，谦谦君子

李佃来曾经为生病后的陶德麟送过三年书信，多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让李佃来对老先生有了更多的观察。在李佃来看来，任何一个和老先生第一次接触的人，都很诧异这位大学者竟然一点儿也不高冷，而是非常平易近人。陶德麟会认真询问每一位新同事，哪怕是会议上遇到的一个新人，都会认真记下他的名字。

“80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可，自从孩子出生后，每次去陶先生家，老先生都会关切地询问宝宝的生长发育情况，还颇有兴趣地谈起自己小时候的情形。

周可感慨地说，陶先生常说时下的评价体系给了年轻人太大的压力，逼得他们脚底劲早出成果、多出成果。所以，每次周可帮他解决电脑方面的小问题时，陶先生总是满怀歉意，觉得占用了周可太多时间。

朱传荣至今记得1958年8月从北京大学来武汉大学报到后与陶德麟初次会面的情景。陶德麟年过八旬，还能说出两人初次会面时，朱传荣穿的衣服颜色和式样。

在“文化大革命”中，陶德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蹲过牛棚，当过猪倌，做过炊事员，甚至遭受过错误的批斗。后来，他走上武汉大学主要领导岗位，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对“整”过他的人打击报复。相反，他经常“以德报怨”，关心和帮助“整”他的人以及他们子女的学习和工作。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武汉大学校训，就是陶德麟担任校长时拟定的。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在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后勤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武汉大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许正是年轻时的丰富经历，更加促成陶德麟成为一名无比坚强的人、一个很有定力的人。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他都有一颗坚强乐观的心。

朱传荣说，陶德麟年近古稀仍抓时间苦读苦学的精神，令人起敬。在理论研究上，他从不吃“老本”，总是与时俱进充实新内容，而且还积极涉猎和关注其他学科的学术进展。

1986年底，朱传荣和陶德麟一同乘火车去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陶德麟因乘火车睡不着觉，就取出小本子背诵英语单词，为适应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他硬是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英语水平。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以清晰流利的口语做了题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交流》的主题演讲，受到与会的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的称赞。

杨鲜兰至今保存着一张导师陶德麟先生手写的便条。

原来，有一次杨鲜兰约好要到导师家里汇报学习情况，但老师临时有事，又无法及时联系，陶德麟就用毛笔写了一张便条让师妹转交给杨鲜兰。导师用普通话，书法漂亮，那也是杨鲜兰第一次见到陶先生的字。

后来杨鲜兰读了老师的一本题为《步履艰辛》的著作，才明白老师语言、文字、文章功力的厚重积累。

在李佃来看来，陶德麟不仅古文、书法、诗歌有功底，还会自拉自唱京剧，更是一位不排斥新鲜事物的老人，80多岁依然勤奋，用电脑打字，笔耕不辍。“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知‘老之将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而已。”陶德麟曾经笑着。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继海，对导师陶德麟作为教育家把学生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印象最深。

晚年的陶德麟曾经自谦写道：“我深感自己是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的哲学大海里乘槎而行。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

陶烙鼓铸，德厚流光，麟角凤皇。一代宗师，乘桴远去，却留下无尽光芒。